

河北与海外汉学研究

孟庆波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河北作为我国经济、人口和文化大省,历来是海外汉学关注的一个核心区域。河北与海外汉学关联密切,清末民初甚至成为法国在华汉学的两大研究中心之一;近代以来,国外学术体系对河北所进行的经济、社会研究成果丰硕,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河北大学的西文善本书收藏也极具研究价值。作为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握有珍贵的研究资源,河北应该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海外汉学;河北;耶稣会;文献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4)01-0093-06

汉学(Sinology)是国外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和宗教等的人文科学研究,自明代耶稣会士来华始,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国外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的社会科学研究,发源于美国,有大约八十年的历史。应该承认,汉学与中国学之间存在学术分野。如果在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对敦煌经籍的研究和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对中国市场层级体系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作一对比,我们就能发现汉学与中国学的学术着眼点和学术手段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些国外研究不管是使用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手段,中国在其中都只是材料的来源地或理论的试验场,它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中国而中国,而是为了丰富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意识、理论框架、话语体系和学术影响都是西方的。在“传教士汉学”时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及政府体制曾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就是明显例证。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借用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 1951-)的说法,是通过“迂回”中国“进入”西方^①,或者借用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みぞぐちこうちゆう, 1932-

2010)的话,中国只是“作为方法的中国”^②。本文探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河北因素,属于区域文化研究,不涉及汉学与中国学在学理上的差异,而是更强调它们在学术对象上的共性。因此本文不作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分,统称为海外汉学。

我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机构建制方面,已经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等十几家专门的研究机构;在期刊建设方面,出版物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国际汉学》、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外中国学评论》、北京语言大学主编的《汉学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的《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学季刊》以及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学研究通讯》等十几种专业的学术期刊。此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③、“世界汉学家大会”^④和“世界中国学论

收稿日期:2013-09-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2007JJD751073)。

作者简介:孟庆波(1977-),男,河北卢龙人,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欧美汉学史研究。

①参见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参见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③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截止到2012年8月已经组织翻译了135部汉学著作。

④世界汉学大会由孔子学院总部暨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2007年第1届、2009年第2届和2012年第3届均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其中第3届大会共有70多位汉学家及100余名中国学者参加。

坛”^①的交替举办,更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热度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汉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二十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正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一门“显学”。

河北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是中华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文化具有典型性,因而受到来华外国人及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中国政治史上,因环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之一——北京,河北因此也居于较突出的位置。文化、人口、经济与政治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外国人在研究中国时均把河北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对象,也使河北与海外汉学的历史和现实发展均密切关联。

一、河间府的法国耶稣会士

严格说来,汉学始自明末清初的西方来华传教士。1581年和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us, 1543-1607)、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相继自澳门进入内地,由此开启了以十六世纪末为肇端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这些传教士到达中国后,学习汉语、苦读经典、研究中国文化,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曾在欧洲引发“中国热”^②并继而为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作出直接贡献。但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等礼仪的去留问题造成了清朝皇帝和梵蒂冈教皇之间的“礼仪之争”,也最终导致清政府的全面禁教。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传教士们又重返中国。正是在这一年,法国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和直隶河间府成立一南一北两个传教中心^③,至此,河北成为此期中国基督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汉学史的重要基地。潘小松在他的《献县访拉丁文》中曾说,“19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的两个中心一个在巴黎,另一个就在河间府献县张庄天主教总堂内。这里的中西文藏书曾达20万册左右……要是这些藏书还在,至少罗马和巴黎研究耶稣会远东传教历史的学者们得到这里来做研究”^[1],可见当时在传教士经营下河间府的汉学研究之盛。在河间府的耶稣会士中,出现了两

位大汉学家,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悉心研究中国文化,在西方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年1月14日出生在法国彼卡底(Picardie),1870年4月来华,在河间府东南教会任传教士多年,1919年11月19日逝于献县,葬于云台山。他酷爱中国典籍,翻译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古籍,用法文和拉丁文译出了《四书》(1895年)、《诗经》(1896年)、《书经》(1897年)、《礼记》(1899年)、《春秋左传》(1914年)、《仪礼》(1916年)等书^[2],成为中国典籍西传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和理雅各(James Legg, 1815-1897)、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顾赛芬的译文通常用法语和拉丁语对汉语同时进行译释,文笔优雅流畅,汉-拉-法语的三方对照使得译本的可读性很强。他在行文中无意加入个人的解释和评论,而是努力忠实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程朱理学派的观点,译风严谨,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主教士译经活动的集大成者”^[3]。顾赛芬还热心于编写汉外词典,1877年推出其首部《汉文拉丁文字典》(1907年再版)。他的代表作是1884年的《法汉字典》(1908年再版)和1890年出版的《汉语古文字典》,尤其是后者收入了中国官话中最常用的短语,成为研究中国古文献的必备工具书,法国汉学权威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曾评价它是此类词书中的最佳者。除此之外,顾赛芬还编有《汉语经典词典》(1904年)和《官话》(1896年),他所编写的《汉英法语会话指南》到1920年就已经再版十次。在词典编写过程中,顾赛芬设计了“法国远东学院拼音”(EFEO),后发展成法语世界标注汉语语音的通行标准,与威妥玛-翟理斯的英语标音体系(Wade-Giles)一起,并称西方世界的两大汉语标音系统。因为顾赛芬在汉学领域的卓越贡献,他曾在1886年和1891年两次被授予法国汉学界的最高奖“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

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年6月9日出生于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1881年来华,开始时作为医学传教士从事农村卫生工作,后来致力于汉学研究,1933年3月25日逝于献县,后葬于云台山。在传教方面,戴遂良对中国第一次

①世界中国学论坛由上海市政府和上海社科院联合主办。2004年第1届、2006年第2届、2008年第3届、2010年第4届和2013年第5届均在上海举办,其中第5届论坛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80名学者共同参与。

②详细情况可参考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

③国内学界对上海徐家汇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其耶稣会藏书楼的藏书已经支持了几篇博士论文的产生,但学界对河间府耶稣会的研究目前几为空白。

“非基督教运动”作出回应,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与基督教拒绝妥协、拒绝适应中国文化有直接关联^[4],他被称为“晚明以来三百年间能够真正承袭利玛窦遗风的耶稣会传人”;戴遂良精研中国思想史和民间宗教,是“那个时代顶尖的耶稣会士汉学家”^[5]。他编著有《中国近代民间传说》(1909年)、《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史》(1927年)、《中国的哲学与宗教》(1917年)以及十卷本的《现代中国》等33部著作^[6],尤其是《中国近代民间传说》标志着在华耶稣会从注重宫廷、学者的趣味,转为同样重视下层民众的信仰,开始了系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7]。戴遂良在宗教领域的贡献很大,出版有《中国佛教》(1910,1913年)、《佛陀的中文传记》,1911年出版有《道教》第一卷,名为《总目录》,包括《道藏》官修引得和私修引得两部分,书中还有《号数推算表》和《道藏分类表》,1913年出版的《道教》第二卷《道教的天师》,包括了《老子》、《列子》和《庄子》三部分^[8]。戴遂良还出版了一套《历史文献》(1903-1905,共三卷),取自哲学家朱熹的著作《文献通考》。他在1892年编写的教材《汉语入门》分为两部共十二卷,第一部为汉语口语及语法课本,第二部为书面语及文化课本,书中的选材体现了晚清白话文发展的新趋势。戴遂良的著作中广泛涉及中国的语言、历史、哲学、典籍、道教、佛教和民俗等。戴遂良也在1905年获得“儒莲奖”。

二、汉学文献中的河北

河北不仅有河间府的耶稣会士直接“生产”汉学,它也很好地架构了汉学,使其成为汉学文献中的广泛题材。本文将关涉河北的汉学文献分为两类:直接以河北为研究主题的文献以及旁及到河北的文献。先看以河北为研究主题的几例典型文献:

1877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在唐山创建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该矿的创办对中国的铁路、机械、通讯、海运、建材、码头等多项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57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Ellsworth Clayton Carlson教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Kaiping Mines, 1877-1912*

(《开平煤矿,1877-1912》)^①,是英语世界对开平煤矿进行研究的首部专著。Carlson于1917年5月27日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193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同年应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之召来华执教、从政至1944年。回美国后他师从哈佛大学汉学权威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 1910-1990)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 1907-1991),1952年获博士学位,是美国汉学界的主流学者。此书以开平煤矿为个案,通过开平煤矿的创立过程,研究了清朝末年西方企业模式在中国的引进情况,并对“官督商办”体制的产生进行了探讨^[9]。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是日军侵华时期日本人对东北及华北地区农业及农村发展状况所作的一次全面调查,后编撰成书,共分六册^[10]。该书的本意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为侵华日军提供具体的资料和情报,但因为参与调查的人员多为专家学者,其调查的方法和结果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性,从而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资料宝库。因为河北是该项调查的重点区域,国外学界不乏利用该书进行相关研究的案例,这里仅举两例。1970年,美国汉学家、经济学家马若孟(Ramon Hawley Myers, 1929-)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一书^②,此书的大量材料均取自《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该书以土地问题入手,对河北及山东地区农民的经济理性和农村的市场经济做了有益的探讨,分析了地主-佃农的经济关系以及造成中国农村贫困现象的诸多成因,是对华北农村经济状况研究最为详尽的著作^[11]。第二个例证来自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1950-)。杜赞奇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以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1976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史,在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 1933-)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传统的乡村社会,1983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了*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③。在此书中,杜赞奇同样也大量使用了日文的《中国

①参见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Kaiping Mines, 1877-191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②此书在刘东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已有中译本,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③此书在刘东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已有中译本,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农村惯行调查》，以河北、山东两省六县六个村庄(河北的有顺义县沙井村、良乡县吴店村、昌黎县侯家营村、栾城县寺北柴村)为分析对象，考察了1900年到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般状况。该书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最高奖“费正清奖”(Johu K. Fairbank prize)以及1990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中国研究的最高奖“列文森奖”(Levenson Prize for Books in Chinese Studies)。

2008年,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主编的两卷本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up to 1949* (《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史》)由 BRILL/Global Oriental 出版,收录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乐仁(J. B. Taylor, 1878-1951)的 *The Hopei Pottery Indust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sation* (《河北的陶瓷产业与现代化问题》)一文。作者曾在1930年2月14日举行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科学学会(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年会上宣读。该文聚焦于河北的陶瓷行业,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视为东方生产模式下传统行业和经济组织的一个样本,考察这种经济形式在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前的特征和运行情况以及与现代生产方式接触后工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变化^[12]。

以河北为次要主题或涉及到河北的文献就更多,篇幅所限,本文仅试举两例:

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 1896-1963),1923年和1931年分别获得芝加哥大学地质学、克拉克大学地理学两个博士学位,以浸礼会教士身份来华,1922~1927年任沪江大学副教授,曾到内蒙、西藏和河北等地调查,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开创者之一。葛德石平生热爱中国,著有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中国地理基础:土地及其民族概论》)、*Land of the 500 Million: A Geography of China* (《五亿人民的国家:中国地理》)和 *Agricultural Regions of Asia* (《亚洲的农业区域》)等^[13]。在葛德石的日记中我们发现他在1926年曾来河北滦县考察:“滦河考察一直进展地很好。直至7月13日,我突然被大约六个土匪袭击。我有科尔特手枪,但为时已晚。这些人专门抢枪和钱。他们连抢加破坏导致我损失上千元。幸亏他们没有把我当人质带走”^[14]。葛德石

出于对地质学的最高热忱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他对中国地质国情的考察。在其代表作《中国地理基础:土地及其民族概论》中,我们看到他对河北地质的描述细致、权威,留下了当时河北一带有关土壤、降水、河流、农业、人口、交通、城市分布等的详细数据。例如,根据葛德石的记录,当时保定的年降水量为381毫米,1922年保定人口为10万人、唐山人口为8万5千人,秦皇岛1926年的人口为5千人^[15]。此外,书中所附的地图和照片也极具史料价值。但遗憾的是,河北学界似乎尚未对葛德石的河北地质考察作出专门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馆藏增加量最高的图书馆。与河北关联密切的是该馆的中国方志收藏^①。方志承载了一个地区经济、政治、人文等多重信息,是研究区域文化最宝贵的材料,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方志收藏中,河北方志最多,计有282种^[16]。

河北也出产汉学家。谭朴森(Paul Thompson, 1931-2007)出生于河北邢台,父母均是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北爱尔兰传教士。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随父母返回北爱尔兰,而后在荷兰、美国、日本和台湾游学或短期任教,六十年代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1963-197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197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与刘殿爵(D. C. Lau, 1921-2010)和葛瑞汉(A. C. Graham, 1919-1991)等著名学者一起工作。中国的《慎子》成书于公元前275年左右,一千多年前失传。谭朴森自五十年代起就对此书进行研究,并于1979年推出代表作《慎子逸文》。该书堪称校勘考据学领域卓越的开创性著作,从不同的典籍引文中整理出数百条《慎子》佚文,将其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对勘,最终集成一部信而有征的最新校勘本。谭朴森不仅证实了《慎子》一书的存在,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它进行了复原,这部书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一直享有盛誉。此外,谭朴森还极为关注中国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进展,曾设计以计算机系统录入并管理中文的古代文本,对推动国内的出土典籍研究作出很大贡献^[17]。

陈世骧(1912-1971),美国华裔汉学家,祖籍河北滦县,1935年北京外国语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在长沙湖南大学任教,1941年转赴美国,在哈佛大学及

①朱世嘉先生1942年曾在华盛顿出版了《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可惜笔者未见。

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研工作,1945年受聘加州伯克利大学,曾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筹办比较文学课程^[18]。在伯克利大学期间,他结交杨联陞、吴鲁芹、夏济安、夏志清等留美学者,延揽张爱玲加盟加州大学,同时育才无数,聂华苓、郑愁予、痖弦、商禽、杨牧等一大批台湾作家、学者都曾受到他的指点和提携,开创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人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19]。陈世骧对中国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致力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诗歌,在其系列代表作《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中,他运用“差异性”理论,首倡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来分疏中西文学,认为西方文学源于《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而中国文学的荣耀则在于抒情诗传统。他甚至把抒情传统上升为中国文化的道统,以与强势的西方叙事传统分庭抗礼^[20]。陈世骧的抒情文学体系后来又经美国华裔学者高友工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大陆地区以外最重要的中国文学解释体系”。杨牧曾编纂《陈世骧文存》,1972年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

三、河北在汉学研究上的贡献和潜力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河北与海外汉学关联密切。散失在那些西方文献中的河北文化、河北记忆均有足够的潜力和空间成为挖掘河北文化资源、促进河北学术发展的新平台。

在国内学界的海外汉学研究中,我们发现河北学术界其实早已投身其中,为该项学术的初步繁荣作出了贡献,这主要指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支持。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领路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的力作《国际汉学漫步》(1997)就由该社出版。该书精选了有关海外汉学研究的16篇论文,涉及英、法、美、俄、日、德等西方汉学大国,沟通了中西学术,提纲携领地向学界展示了当时汉学的进展,也为后来的汉学研究确立了学术方向和尺度。若我们梳理一下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肯定会因《国际汉学漫步》的出版而载入史册。

河北也有现成的汉学资源可供挖掘。2005年4月出版的《国际汉学》第十二辑刊发了法国人梅谦立(Thierry Meynard,1963-)的《河北大学图书馆所藏西文珍本书基本目录》一文,该文对河北

大学的汉学研究资源作了大致整理。这篇文章让河北学人略感尴尬,但同时也令人惊喜:原来我们手边就有如此上乘的研究素材。二十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在中国成立了三所大学:北平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和天津津沽大学。天津津沽大学就是河北大学的前身,它于1921年由法国耶稣会士创立,原名“天津工商大学”。1927年该校建图书馆,购进大批中外文书籍。据梅谦立辑录,截至1948年,该馆藏书58万多册,包括20多万册外文书籍。在这些外文书籍中,仅1811年之前出版的西文善本书就有110种,250卷,其中有一半为西方原版;更为重要的是,津沽大学图书馆有41种法文图书为中国的唯一藏本^[21]。河北大学图书馆里的这些珍本书目自然是来源于天主教的早期经营,作为慧眼独到的学者,梅谦立对这批藏书评价甚高。目前,对海外汉学的研究顺应了国内的文化建设需求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大势,学界的研究热度越来越高,除前文已列举的成熟研究机构外,新的研究所(中心)也层出不穷^①。河北学界应当充分利用河北大学这批珍贵文献,精心爬梳,推出力作,努力让河北在海外汉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 考 文 献

- [1] 潘小松. 书国漫游[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 [2] 许光华. 法国汉学史[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9.
- [3] 赵晓阳. 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EB/OL]. [2013-09-01]. <http://jds.cass.cn/UploadFiles/ztsjk/2010/11/201011191506042743.pdf>
- [4] 刘国鹏. 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5] J W Witek, S J. 在中国从事汉学研究:戴遂良著述回顾[J]. 世界汉学, 2009年秋季号.
- [6] 宋莉华. 《汉语入门》的小说改编及其白话语体研究[J]. 社会科学, 2010(11).
- [7] 李天刚.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二百年[J]. 历史教学问题, 2008(5).
- [8] 朱越利. 海外道教学研究任重道远[J]. 宗教学研究, 2012(1).
- [9] Albert Feuerwerker. The Kaiping mines (1877-1912) by Ellsworth C Carlson[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59, 18(2).
- [10]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 东京:岩波书店, 1981.

^①据笔者所知,最新的研究机构是中国石油大学海外汉学研究所,于2013年8月成立;此外,中国矿业大学也正在筹建“国际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 [11] Ramon H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1, 31(4).
- [12] J B Taylor. The Hopei pottery industry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isation [M]//Michael Dill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Up to 1949. BRILL/Global Oriental, 2008.
- [13] 赵晓阳. 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与美国早期汉学的转型[J]. 汉学与神学·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7辑), 2007.
- [14] 张雷. 葛德石与中国近代地理学[J]. 地理学报, 2009(10).
- [15] George B 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M].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4.
- [16] 李华伟.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与汉学研究资源[J]. 新世纪图书馆, 2008(1).
- [17]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8] 陈国球. “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J]. 现代中文学刊, 2009(3).
- [19] 沈一帆. 观念的肇始: 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明[J]. 当代文坛, 2012(2).
- [20] 李杨. “抒情”如何“现代”, “现代”怎样“中国”[J]. 天津社会科学, 2013(1).
- [21] 梅谦立. 河北大学图书馆所藏西文珍本书基本目录[J]. 国际汉学(第12辑), 2005.

[责任编辑 勇 慧]

(上接第92页)

- [24] 丁守和. 关于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的若干问题[J]. 东岳论丛, 1996(1).
- [25] 丁守和. 论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J]. 近代史研究, 1995(5).
- [26] 蒋介石. 自信自立与自强[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38: 21.
- [27]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59.
- [28] 中共中央. 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M]//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38.
- [29] 毛泽东. 致蒋介石信(1938年9月29日)[M]//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武汉抗战史料.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7: 86.
- [30] 蒋介石. 争取最后胜利[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38: 37-38.
- [31] 石柏林.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J]. 抗日战争研究, 1994(1).
- [32] 蒋介石. 语法记者[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38: 71-72.
- [33] 编者. 《接纳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的表示》编者的话[M]//程鹏. 抗战以来蒋委员长言论集. 芷江出版社, (年月不详): 8.
- [34] 蒋介石. 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民众书[M]//程鹏. 抗战以来蒋委员长言论集. 芷江出版社, (年月不详).
- [35] 蒋介石. 告全国青年书[M]//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1938: 78-79.
- [36] 袁伟. 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M].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1994: 341.
- [37] 中共中央. 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M]//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25.
- [38] 毛泽东. 关于发展华北游击战争致朱德等电[M]//《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 八路军·文献.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1994: 188.
- [39] 毛泽东. 论持久战[M]//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12-513.
- [40] 中共中央. 关于目前日军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M]//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49.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94.
- [42] 江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文化评析[J]. 史学月刊, 1996(3).
- [43] 赵红.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1.

[责任编辑 李丹葵]